

1919—1949:川东革命老区的红色社团活动

陈正平

(四川文理学院 中文系,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川东革命老区在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活跃着此起彼伏的革命的或进步的社团活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川东萌生了最初的红色社团。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红色社团,在宣传革命和进步思想,唤起广大民众,团聚革命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关键词:1919—1949;川东革命老区;红色社团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2)03-0007-08

川东革命老区在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活跃着此起彼伏的革命的或进步的社团活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川东萌生了最初的红色社团。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红色社团,在宣传革命和进步思想,唤起广大民众,团聚革命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1919—1926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川东萌生了最初的红色社团

1917年6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发表了《时局杂感》,表达了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基本思想“政治上之有民主、共和,学术上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在反对旧伦理、旧政治和旧文学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在《新青年》的带动下,

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风气,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社团应运而生。

1917年,《新青年》开始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真正使中国人摆脱了思想的蒙昧,从大本大源上实现了新的觉醒而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时只是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1919年5月9日,后来成为达县中共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达县中学教师张鲤庭(1887—1933)、戴志安(1894—1934)带领达中、女子职校、一高中、五高小进步学生上街游行,大书“舍身救国”、“还我河山”、“誓杀国贼”、“同胞速醒”等横幅,高呼“反对巴黎和约”、“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声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3]6月,戴志安、张鲤庭等人倡议召开达县各中小学学生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成立了“达县学生救国团”,又以该团和达县全体学生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反对巴黎和约、誓争山东主权。^[4]他们还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引导进步青年师生阅读《新

* 收稿日期:2012-01-15

基金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重点项目(SLQ2011A-0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基地项目“1919—1949川东地区红色文艺活动及作品研究”(SC11E016)

作者简介:陈正平(1948—),男,四川平昌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民俗学研究。

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1921年秋,戴志安赴上海考察归来,就任达县蒲家场达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长,成立了“青年读书会”,领导成员戴志安、张鲤庭,该校进步学生江仁安、张爱萍、魏传统等参加。由戴志安、张鲤庭辅导会员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创造》、《改造社会》等刊物,并结合中国时局,研讨社会问题,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文化。又利用假期举办补习班,向学生宣讲革命道理,由张鲤庭主讲“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重点的“当代大事记”;戴志安宣讲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中国封建势力的“时势”,指出国家的复兴在于国民的觉醒。在张、戴的支持下,进步学生冲破封建势力阻挠,把蒲家场静通庵内1000多座大小神像全部捣毁,将昔日阴森恐怖的神堂改成了宽敞明亮的学堂。

在“五四”余波后,邻水青年学子掀起了旅外求学潮。至1923年,邻水县赴京学子已达60余人。经北京大学法学系学生余旭等倡议,成立了邻水旅京同学会“古邻社”,出版社刊《古邻新潮》,宣传新文化思想。1924年夏,在京邻水进步学生赖振声、黄坦、唐维等人又发起成立“新邻社”,至1925年参加人数已达300多人。在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还设立了新邻分社,又以社刊《新邻》为阵地,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家乡,启迪民众思想,引导大批邻水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20年5月,王维舟(1887—1970)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年底赴苏联学习,直接聆听过列宁的演讲。1922年回国,在北京与吴玉章等一起组织“赤心社”,1923年回乡葬母,在家乡宣溪县清溪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通过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同年5月,达县县城成立了“正俗新剧社”,区内话剧爱好者开始结社演出。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是在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的,它以口语和动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戏曲,这种不用锣鼓等音乐,不用唱腔的直白式的新的戏剧形式,在当时被称为“文明新戏”。组织者王耀先、张鲤庭、黄兴盘、雷介眉等

人,最初主要演出反对男尊女卑一类旧俗的剧目,至1925年剧社扩大,邱寄云任社长,演员尹耀先、张小康等10余人,开始演出贴近时事、时政的《五卅惨案》、《虎口行》等多幕话剧。新剧社把话剧作为传播新思想、组织群众、改革社会人生的工具。在当时,这一“新潮”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原因在于:“政治上和社会大变动之后,人民正是极愿听指导,极愿受训练的时候。他们走入剧场,不只是看戏,并且喜欢多晓得一点新的事实,多听一点新理论”。^[5]

1924年秋,开江县教育界王元善、王剑鸣、王鑫玉等人集股成立“启文图书石印社”,以翻印传播新文化教材,推动开江县新文化运动开展为宗旨,经销出售鲁迅主编的《语丝》、郭沫若主编的《创造季刊》、《创造周刊》,以及文学研究会、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多种进步书刊,同时扩大石印业务,承印普安区立小学校刊《晨光》、普安区立女子小学校刊《人格》。“启文石印社”在全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下,一直稳稳地办到1951年3月,由新的“开江县印刷厂”、“开江县新华书店”取代。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宣汉清溪场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王维舟于7月主持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宣传队”,队长王波,有中小學生及社会进步青年30余人参加,他们在街头在茶馆及交通要道打出宣传队旗号进行宣讲活动,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在中华大地上屠杀人民的罪行。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下才停止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5年7月,王维舟接任清溪场宏文学校校长,在校外五贤祠成立“群化书报社”,社内陈列有北京、上海和成、渝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报纸,供群众阅读。1926年春,上海南洋医专学生、共产党员陈峻山(1900—1930),毕业后返回故乡邻水县,任教县立女子小学,组建“读书会”、“学术研究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文化,在此基础上,按中共重庆地委指示开展建党工作。暑期结束,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陈峻山为书记。

1926年5月,戴志安、张鲤庭和县达中、绥定联中学生张端绪(张爱萍)、魏传统、王波、王元昌等人在县达中成立“烂漫社”,这一批年轻人怀有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解放”的壮志理想,又值年少,风华正茂,十分崇拜西方的罗曼蒂克(Romantic)。他们以研究革命理论和进步文学为宗旨,出版《烂漫旬刊》,演出时装新剧,团结进步青年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而展开斗争,后来又发展到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至1926年底,在“烂漫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取代。

二、1927—1937: 配合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红色社团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镇压川东革命力量,压榨剥削川东人民。刘湘、田颂尧、刘存厚等各地军阀采用枪杀、活埋、焚尸等残暴手段,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以“通敌”、“资敌”等罪名杀害了无数的百姓,人民置身于军阀的暴虐统治下,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被剥夺殆尽了。^[6]这正如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斗争历史所指出的那样“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7]川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延续不断的,抗租抗税抗捐抗暴的斗争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各类红色社团在宣传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7年春,达县大树场尹家院内建立了“大同俱乐部”,组织者王维舟、尹耀先(1877—1938)。以开茶社、“打围鼓”的民间文化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唤起民众觉悟,活动时间长达三年。

1928年,达县公立翠屏师范学校成立“马列读书会”,组织者为中共达县县委书记、翠师教员罗又韩,为区内第一个由共产党员领导,亮出鲜明革命旗帜的读书会。达县黄都、大树、檀木、万家、蒲家等乡,联合建立阵容庞大的新剧团,组织者为受党派遣回乡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唐伯壮(1899—1929)及唐仲明、唐予可、尹耀先,演员有魏传统等14人,演出剧目有《军阀鉴》、《团

鉴》、《学阀鉴》等话剧和一批活报剧,其特点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自编剧目,演出区域为达县、梁平、开江三县。

1928年,达县成立“青年协进会”,初于渡市小学内,后迁花竹溪。魏传统(时任渡市小学训育主任、中共党员)、王立笃(渡市小学校长)为负责人。编演进步话剧、编唱、传唱进步歌曲,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的罪行,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利用课余时间,在街头、农村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1929年底因魏传统的调离而终止活动。

1929年4月27日,李家俊(1902—1931)、王维舟在万源固军坝领导和指挥了川东农民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队”,率先在中国西部树起了工农民主革命的大旗,极大地“打击了军阀、团阀及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武装,而且还在于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乡村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在四川的一次重要实践”。^[8]

1929年秋,中共宣汉特支成员向文成、王化肃、金戢声,在开江中学团结进步学生成立“新文艺研究会”,出版《荆棘》油印半月刊,登载会员新文化思想时评及新文艺作品。同期,邻水在成都读书的学生100多人,成立了“邻水旅省学生会”,以新观念、新文化输入桑梓,启发民智,革除时弊。学子们身在成都,心系故土,创办《邻水旅省学生》报,因思想激进,只出一期便遭查封。

1930年8月,大竹组建“军民俱乐部”。中共大竹特别支部书记张为铸将大竹城竹阳公园开辟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文化活动阵地。为得到驻军支持,成立军民同乐的“军民俱乐部”,实为中共大竹特支一个既公开又隐蔽的活动场所。于此开设茶社、书报社,团聚、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组建“话剧团”。活动近一年被迫解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宣汉县委书记王荣树以县教育局督学身份,在宣汉城区女子高级小学动员进步音乐教师吴瑞芳(女)组织“女子反日宣传队”,队长冉崇松,队员共有20余人。1931年10月9日打出“誓死反日”旗帜沿街游行示威,高呼反日口号,演唱《打倒列强》等歌曲,队员轮流上台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三省的罪行。宣传队还办有壁报半月刊《学习园

地》,刊载《日军占领东三省惨杀我同胞》、《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日本一日不倒,反日工作一时不罢休》等文章。或上街、下乡教群众唱反帝反封建的歌曲。重庆《大声日报》1931年10月21日曾报道“宣汉县女子宣传队员努力反日宣传,常在各宣传队之先,闻者莫不悲愤,誓与日本不两立云。”宣传队的反日活动一直持续到1933年。

1931年中共渠县特别支部直接领导和成立了“岩峰读书会”,由中共党员教师罗光藻、石攻玉等人发起,以岩峰高级小学为基地,展开秘密阅读革命书刊,宣讲《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社会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半公开阅读《创造月刊》、《创造季刊》、《新思潮》、《拓荒者》、《洪水》、《语丝》、《太阳月刊》等新文艺刊物。1933年秋,红军入川,会员多参加渠县特别支部创立的独立营,读书会解散。12月,由中共渠县县委书记唐毅等人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秘密团体,参加者须有人介绍,1938年改为“爱知读书会”,作为合法团体申报备案后,在县城公然召开成立大会,筹备时有30余人,正式成立时有会员100余人。又在城关、临巴、三汇、岩峰、青溪、宝城等地设立分会或小组。读书会成员多为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又多以各地高级小学为阵地,先后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队,通过演出话剧、讲演、壁报、教唱革命歌曲等活动,激发民众抗日热情。至1940年活动终止。

1932年上半年,中共渠县特别支部外围组织“岩峰革命行动社”在岩峰高级小学成立,由校长、中共党员罗光藻负责。宗旨是通过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的学习,为开展武装斗争做思想准备。社员以教职工为主,也有进步学生和青年农民参加。“特支”决定,首先把岩峰高小办成红色小学,建立革命据点,造就一批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曾发起组织了闻名全县的打“狗”运动,追查一桩贪污案。1933年秋,因大部分社员参加了红军,行动社解体。5月,渠县清溪场成立“抗日新剧团”。9月,栖贤寺小学剧团成立。岩峰栖贤寺小学与玉清宫女子小学,是中共渠县特支活动据点。“特支”以小学校名义,成立临时的小学剧团,由两校师生联合演出,节假日到各地巡回宣传

演出。自编自演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流传最广,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苏区后,还节选唱词在各地教唱。1934年1月红军离开渠县,中共渠县特支活动发生重大变化,剧团活动终止。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红军和那里的群众团结一心,立农会、斗土豪、开粮仓、分土地、打军阀”,^[9]如火如荼的苏维埃运动使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人民的革命激情空前高涨。1933年春,渠县城进步青年龚仪宣、夏白、周孟基(后均加入中共)等人发起成立“促进读书会”,利用周末集中阅读、研讨马列著作和新文化刊物,出版《促进月刊》,至年底活动终止。

1934年渠县成立“回春剧团”,演员以泮林小学(今渠江镇一小前身)师生为主,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明戏”。抗战爆发后,作为“渠县抗战后援会”的一支宣传力量,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和以抗战为题材的新剧。

1936年夏,邻水县初中学生周致远、甘致祥在进步教师张子静、胡正浒的教育引导下,联络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秘密成立“生活读书会”,以校图书馆为基地,开展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的活动。同时,在邻水县政府任职的甘惜分等人联络当地进步青年秘密成立“青年读书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读书会于1937年暑期合并成立“星光图书社”,共30多人,该社汇集马列著作和新文化代表作品近3000册,以革命的、进步的书刊武装青年的头脑,为中共邻水地下组织重建和发展做了思想、理论和干部的准备。

三、1937—1945:鼓动、组织抗日救亡的红色社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救亡战争由此全面展开。其实早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10]他认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和打击。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新的抗日社团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新的政治要求,在发动军民总动员、促成抗日民族大团结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1937年7月,邻水“抗日救亡歌咏会”、“抗日壁报社”成立,由进步青年甘惜分、欧汝钦组织领导,会员最多时达百人以上。会员们晚上集中练唱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渔光曲》等,白天在街头演唱,还印发抗战宣传资料,张贴抗战标语,很快把抗日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点燃了城乡民众抗日激情。1937年冬,甘惜分、欧汝钦、许建业等人决定从“歌咏会”中抽调骨干组成“抗日移动宣传队”,到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秋,预定宣传任务完成而解散,后来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欧汝钦、许建业成为了彪炳党史的革命先烈。

1937年9月,中共党员刘先慎、蔡新程等人发起成立“大竹抗敌剧团”,旨在“发扬抗敌民气”,活动内容为巡回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歌剧,出版壁报,组织盛大游行和为前线战士捐赠寒衣。1940年被反动政府勒令解散。1937年秋,大竹县杨通乡私立徐氏小学组建“小先生剧团”,到本区乡镇及县城演出抗日宣传剧目。9月,达县“大众话剧社”成立,社址设在“明达公学”内,陈孟汀、李学荣为领导,剧社成员有中小学师生、工人、农民、店员,后发展到230余人的抗日宣传队,并在乡镇设分社。12月,大竹县三区(石桥)高级小学校长、中共党员王思源动员本校进步师生,组成“大竹三高救亡宣传团”,创作演出街头剧、教唱抗日歌曲。1939年7月被迫解散。

1938年3月,由开江县“抗敌后援会”组建“大众剧社”,开江县民众教育馆为社址,王剑鸣(1899—1955)为社长,社员约30人,多为中小学教师,业余演出抗日题材的话剧、歌曲、曲艺、舞蹈、国术等文艺作品,1940年被迫解散。4月,宣汉县成立“城区中小学抗日读书会”,出版《觉醒》画刊。6月,宋更新、魏光鉴在开江永兴小学开办“抗日读书会”,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大众哲学》、《新华日报》以及艾思奇、周扬、张闻天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还举办国内形势讲座,创办抗日壁报,讲解中共抗战方针政策,教唱抗战歌曲。学员中有30多人后来前往延安“抗大”深造。7月,开江任市镇酷爱川剧艺术的罗承荣辞去任市小学校长职

务,当尽百亩田产筹资成立“七七剧社”,自任剧团团长,带领全体成员在开江、达县、梁平等地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演出收入全部捐献抗日前线。7月,中共渠县特支书记、临巴高级小学教师唐毅在渠县发起成立“抗日救亡暑期宣传队”,组建“临巴小学剧团”;杨德远等人在渠县清溪场组建“爱知读书会”;渠县宝城高级小学成立了“宝城镇抗敌剧社”。

1939年5月,宣汉县柏树场进步人士王寿民发起募捐成立“民众书报社”,陈列红色书报杂志,宣传革命,动员全民抗日,后被反动当局查封。9月,中共党员冉思源(1919—1949)、彭立人(1923—1949)等发起成立达县“渡市抗日救亡宣传队”,教唱抗日歌曲、自编自演剧目宣传抗日。时任达县联中和达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音乐教师王抒情(1913—1960),在中共党员教师、学生的支持下,组建“抗日救亡歌咏团”,自任团长和音乐指挥,参加的师生有70余人,常在达县、宣汉、开江、邻水、万源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歌咏队出外演出宣传,均以横标为先导,其后队鼓、军号齐鸣,列队行进,个个精神抖擞。1940年5月,王抒情在达县城各校师生支持下,组成多达2000人参加的合唱团,在达城北门大操场演唱组歌《红五月之歌》,纪念国际劳动节,歌颂团结抗战。9月,大竹县进步人士范舜法发起组织“大竹县音乐戏剧研究社”。通江县铁佛乡中心小学为宣传抗日救亡成立了“学生剧团”。

1940年6月,中共达县中学支部负责人彭立人、刘学纲组建“达县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城乡广泛开展团结抗日宣传活动。达县檀木场的“联中”高中部成立了“抗日歌咏团”,王道兴、曾凡分任正副团长,进步学生百余人参加,其宗旨为演唱革命歌曲,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抗战激情。他们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到附近县、区乡镇演出,至1943年因骨干成员离校而解散。

1941年南江县成立“自强剧团”,由南江初中校、治城中心小学师生和县政府一些职员,共计30余人参加,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至1946年终止活动。

1942年春,大竹县白坝小学校长尹尚忠与中共大竹地下组织联络,成立白坝小学“竹声剧团”,动员全民抗日,共有师生37人参加。夏,达

县双龙场文武庙成立“大同音乐社”,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爱国教师李职为领导,共有30余人参加,多为川剧爱好者,他们在茶馆、酒肆开展群众性的“打围鼓”活动。1943年该社又组织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提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潼关吃紧,四川危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自编自演话剧、歌曲,进行抗日募捐活动。

1943年5月,“大竹县业余剧社”成立,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蒋道通、周道隆、胡伯梅等人发起组织,共有30多名会员,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剧社才终止活动。7月,达县石桥成立“醒民宣传团”,进步教师胡立魁、任明伟为领导,有30多名师生参加。他们利用假期在周围场镇表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为抗日前线募捐。秋,巴中县“化成乡中心小学读书会”成立。由地下党员王朴庵、郝谦等人领导,其宗旨为团结进步师生,秘密研读革命书籍,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读书会由小学转入中学,其活动延续到1949年底巴中解放。

1945年春,中共党员王远智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达县开展工作,他以任教的达县县立中学42班学生为主体建立“燎原学术研究社”,出版《燎原》壁报。同年秋,将燎原社发展成4个分社开展革命活动。7月,宣汉县“峰城抗日读书会”在峰城乡唐家嘴成立,会长冉雨生,通过阅读红色书报刊物和中共方针政策,提高会员觉悟。日本投降后,又以此为阵地,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至1947年停止活动。9月,宣汉南坝精英中学成立“小灯”文学社,出版《小灯》半月刊,社长宋守先,旨在唤醒民众,加强民众团结,以小灯照亮黑暗,辨明前进的方向。10月,也是在南坝精英中学又成立“普金”文学社,社长任登凡,旨在提倡民主,伸张正义,抨击时弊。

“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操是一脉相承的,每当国难当头的时候,都有顶天立地的硬汉挺身而出,显出民族的脊梁。”^[11]八年抗战,腥风血雨。川东红色社团为抗日救亡鼓动呐喊,川东儿女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首次获胜。

四、1946—1949:为解放战争胜利鼓与呼的红色社团

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新生活的到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造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新的灾难。在川东,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已达到极点,官员贪污腐化、敲诈勒索,特务横行,匪患不断,加之灾荒连年,民生凋敝,各地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为了唤醒民众彻底放弃对蒋介石寻求和平的幻想,中共中央告诫全国民众,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就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并且指出“任何势力只要是反动的,不管它怎样强大,它一定要倒下去”。^[12]这一时期的川东红色社团,配合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使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是求解放求幸福的惟一道路。

1946年5月,宣汉中学中共党员教师沈自谦、陈微尘在师生中秘密组织了“银鱼学术研究会”,会长郭俊铎,成员20多人,他们订阅《新华日报》、《新观察》、《解放》等报刊,暗中传阅、研讨《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讨论重庆谈判的意义。镇中心校成立“青年学友会”,旨在联络青年学习马列和中共方针政策,宣传革命思想。

1947年6月,南江县神潭溪成立“醒群音乐社”,旨在唤醒民众,提高民众革命觉悟,关注解放战争的进展。

1947年,邻水“邻英学术运动联谊会”成立,会址设在县民众教育馆,名誉会长张志刚,会长殷兴让。拟有章程,作有会歌。其活动有:(1)创办石印《邻英月刊》,内容为本地新闻,摘转国内新闻、简评及文艺创作,旨在传播进步思想。(2)排演话剧。(3)开展体育健身活动。(4)开设茶园,讨论政治时事、开展文娱活动,团聚进步人士。至1948年秋停止活动。

1947年7月,达县赵家乡青年教师杨晓初、邓文光为首成立“青年学会”,组织无业知识青年一起学习,互相勉励,以求进步,学会下设事业、交际、书报、文体、总务五股,会员每人出稻谷一斗(约30斤)作为学会基金。1948年冬解散。同年9月,中共大竹县特支派党员王思静(1910—1985)到大竹团管区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创建

群众性文娱社团“新生社”,社员有30余人,他们演出进步剧目、讽刺时政、揭露社会腐败,1948年6月被迫解散。11月,省立大竹师范学校中共地下组织在校内组建“梨声音乐舞蹈团”,为川东惟一革命音乐舞蹈团体。

1949年3月,大竹县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通过文化活动策动“团管区”起义以迎接解放。

1949年5月,达县蒲家场中共党员彭时怀、王朝伟组织成立“更生俱乐部”,联合进步青年,以开茶馆、打围鼓为掩护,暗中发动师生、民众做好迎接新中国解放的准备工作。

至1949年12月,川东各地已全部解放。欢庆胜利的锣鼓声、鞭炮声宣告光辉的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五、结语

(一) 1919—1949年川东地区红色社团活动的主体,是一批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多为各地中小学师生。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深感青年肩上责任重大。诚如1921年毛泽东讲过的一段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3]因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14]他们最先感知时代的脉搏,立志改造社会,挺身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头,引领民众投身现实的革命斗争。他们中的不少人在革命战争中捐躯,或为国民党反动派监禁杀害,或成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血染的青春风采,成了我们永远的红色记忆。

(二) 川东红色社团的领导者、组织者大都是一些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就读过或在苏联留过学的青年,如王维舟、李家俊、张鲤庭、戴志安、熊复、甘惜分等人。他们是一批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知先觉。他们总是把个人的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国内特别是川东地区不断发生的重大事变,直接间接地激活了改变社会人生的积极性,他们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川东各地党组织最早的领导人。在这些杰出人物的周围又团聚了大批进步青年,如张

爱萍、魏传统、牟永正、彭立人、冉思源、宋更新等,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

(三) 这一时期的红色社团以文化团体为主。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读书会”、“研究会”式的社团,率先掀起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运动。这类社团集合了革命精英,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作了理论准备。以“剧社”、“歌咏队”、“宣传队”配合时事演出、宣传,唤醒民众,为革命呐喊助威,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由于反动当局的压制或社团骨干人员的流动,社团生存的时间或长或短。不少社团思想和组织准备不充分,又以青年师生为主体,难免激进化、理想化,具有不成熟性。但总的看来,这些红色社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社会进步,成了革命队伍中重要的方面军。

(四) 川东人的性格特征与艰难的时势,造就了红色社团求真务实的独特个性。有论者分析川东人性格及形成原因说“陡峭的山林,贫瘠粘涩的红壤黄泥,火炉般炎热的气候加上夏旱秋涝……在这里,艰险历来与生活共存。艰难的生计、险恶的路程、炎热的气候,以及数千年的传统,造就了巴人急躁爽直而又行为能力极强的气质……无怪乎川东历史上仅出过几位默默无闻的状元,但战将却不胜枚举。”^[15]川东红色社团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成员,常常也是武装斗争的领导和成员,他们不尚空谈而行为能力极强,社团活动紧密联系革命斗争实际,社团成了革命武装骨干力量的培训基地。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曾有13万巴山儿女先后参加红军,其中担任军和军以上干部的有140多人,有8万多人为革命牺牲,解放后享受红军烈属待遇的有3万5千多户。

毛泽东在1949年6月15日的《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6]这一预言早已实现。勤劳质朴英雄的川东人民始终不忘革命传统,那一段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正化作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踌躇满志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参考文献:

- [1] 编写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98.
- [2] 杨胜群.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N]. 光明日报, 2011-08-08(12).
- [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25.
- [4] 林超.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256.
- [5] 洪深.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16.
- [6] 林超, 温贤美. 川陕革命根据地史[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16.
- [7]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6.
- [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地方史十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125.
- [9] 魏传统. 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序[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2.
- [10]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56.
- [11] 陈正平. 张爱萍将军诗词创作的内容和特色[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08(6): 22.
- [12] 解放日报社论. 蒋军必败[N]. 解放日报, 1946-09-12(01).
- [13] 唐双宁. 书法: 人类精神的心电图[N]. 光明日报, 2011-08-08(05).
- [14]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青年杂志, 1915(创刊号): 1.
- [15] 陈世松. 天下四川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40.
- [16]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67.

[责任编辑 邓杰]

On Activities of Red Societies in Eastern Sichuan Revolutionary Area from 1919 to 1949

CHEN Zheng - p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 Dazhou Sichuan 635000 ,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or progressive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n in the Eastern Sichuan area from 1919 to 1949. The establishment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 thes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e red societies mainly composed of young intelligences made unforgettable achievements for the propaganda of the progressive idea , the awaking of mass , the form of revolutionary force and the vict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year 1919 to 1949; Eastern Sichuan Revolutionary Area; red societies